

# 社会学视野中 1980 年代主体性 美学的理论谱系与逻辑框架

裴 萱

(河南大学 文艺学研究中心, 河南 开封 475001)

**摘要:**伴随着 1980 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 主体性哲学美学成为反思历史、重塑个体的强大文化思潮; 文学与美学也在不断地与政治分化的过程中, 实现了个体的自由和审美的理想, 呈现出从集体话语、个体彰显, 再到诗化哲学、审美自由和审美文化的历史转型。李泽厚的主体性实践哲学和刘再复的文学主体性, 便成为“美学热”中从哲学到审美、从群体到自我、从机械反映论到主体实践论的理论动力, 人道主义也不仅仅是思想解放的热情, 更是以“主体性”的面貌成为系统化的理论表述和具有学科意识的理性思索。而此种回归人性、倡导自由和文化启蒙的美学思潮也将持续而深入地影响历史。

**关键词:**美学热; 主体性; 人道主义; 积淀说; 审美超越

**中图分类号:**J0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349X(2017)01-0061-11

**DOI:**10.16160/j.cnki.tsxyxb.2017.01.010

## The Theoretical Spectrum and Logical Framework of Subjective Aesthetics in the 1980s from the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PEI Xuan

(Research Center of Literature Theory,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475001, China)

**Abstract:** Along with the ideological liberation movement in the 1980s, the subjective philosophy and aesthetics became a cultural trend in the reflection on history and the reshaping of the individual. In the process of breaking away from politics, literature and aesthetics achieved the individual freedom and aesthetic ideal, transformed to the collective ideology but individual expression, and then to poetic philosophy, aesthetic freedom and aesthetic culture. Li Zehou's subjective practical philosophy and Liu Zaifu's literary subjectivity became a theoretical catalyst for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philosophy to aesthetics, from collectivism to individualism, from mechanical materialism to the theory of subjective practice. Humanitarianism was not only the enthusiasm of the thought liberation, but also a scientific and theoretic-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0BZW002); 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13BWX012); 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研究项目(2016-qn-081);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2016M592277)

**作者简介:**裴萱(1985—), 男, 河南郑州人, 副教授, 博士, 主要从事文艺美学研究。

cal exploration of “subjectivity” as a systematic expression of theory. This aesthetic trend of returning to human nature and advocating freedom and cultural enlightenment, will continue to influence history profoundly.

**Key Words:** aesthetic upsurge; subjectivity; humanitarian; accumulation; aesthetic transcendence

自1980年代新时期以来,人性、人道主义的思潮成为贯穿文学、美学等领域的核心话语,构成了“告别历史”的基本价值取向,即批判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国家强权对个体的压抑和迫害,从而为个体的价值和人的尊严找到合法化存在的路径。以“手稿热”开端的“美学热”正是思想界从文学、美学领域对人道主义从“边缘”到“中心”的尝试<sup>①</sup>,美学的启蒙意义和审美解放的激情体验已经远远超越了“美学热”本身的学科构架与理论铺陈。如果说思想解放和拨乱反正完成了新时期“去政治化”的第一次论述;那么“美学热”就是继续在否定政治工具论和人道主义维度进行“去政治化”的第二次论述。“主体性”作为哲学和美学层面的理论点,不仅仅为“美学热”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理论上的基础,更是成为美学意识形态对抗政治话语的有力承担,所以,李泽厚的“主体性实践哲学”和刘再复的“文学主体性”,便成为“美学热”中从哲学到审美、从群体到自我、从机械反映论到主体实践论的理论动力,人道主义也不仅仅是

思想解放的热情,更是以“主体性”的面貌成为系统化的理论表述和具有学科意识的理性思索。主体性理论一方面以知识分子的启蒙话语衔接了“五四”新文化传统,以“启蒙理性”的姿态完成文化批判与改良,另一方面也以主体意识和学科独立的价值取向为“美学热”提供了强大的哲学理论支撑和理论深入的契机,从实践美学到后实践美学,从美学意识形态到审美主义,都可以看到“主体性”在其中的重要作用。

## 一、主体性美学的生成:知识社会学视野中的历史反思

从李泽厚的“主体性实践哲学”到刘再复的“文学主体性”,“去政治化”的诉求以及对人性和人道主义的还原成为内在贯穿的线索,而理论的建构和思想的超越往往伴随着历史的争鸣。实践主体性和文学主体性作为新时期哲学和思想话语的转型,以一种激进而又突兀的方式改变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二元对立和政治统摄的话语格局,同时也保持

<sup>①</sup> 据统计,在“美学热”刚开始兴起的四年中(1978—1982),学术界和知识界发表了大量有关美学研究的论文、专著,并召开了大规模的美学研讨会和进修班。据现有资料和中国知网的学术论文检索数量可以得知,国内报刊杂志以美学和美为主题的文章在这四年中呈急速上升的趋势。同时,据刘三平《1980年以来美学原理著作概况》(载《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和《中国图书年鉴》《中国文化产业学术年鉴(1979—2002年卷)》统计,相关美学专著、美学资料汇编和美学史著作等共计33册,编写的美学期刊、集刊近20种。1980年5月和10月,中华全国美学学会以及美学高校教师进修班都得以成功举办。中华全国美学学会的成立,标志着美学学科有了自身的场域空间和知识学范畴,在这次会议上,来自全国二十几个省市自治区的美学专家和科研工作者就美感、美的本质、形象思维等问题进行讨论。北京师范大学组织的美学进修班汇聚了王朝闻、李泽厚、朱光潜等美学名师,他们的讲稿汇编成《美学讲演集》。由此可见,“美学热”作为一种学术现象已经成为当时的“显学”,深刻而持续地影响着社会与学术思潮的走向。

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实践特色与理论取向。主体性理论的实践使人们看到传统政治神话的超越并不像设想的那样艰难,“老左派”在理论的论争中也显示出某种“力不从心”的虚弱和保守的滑稽色彩。打破“总体性”话语的束缚和实现个体的价值,不仅仅是知识分子的理论构架,也是以“美学热”的方式展现了一个时代的青春热情。对于从“文革”神话和理想世界中走出来的新时期的人们而言,如何重塑精神价值、人生理念、道德取向和文化结构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而相比较于朱光潜和周扬在人性问题上的直接表达,李泽厚选取了一种更为稳定和谐的“马克思—康德”式的主体性实践观念,并以此来建构迥异于革命主体和反映论模式的、崭新的“新主体”。一方面,实践主体理论合理吸收、生发了马克思理论中的实践性,同时又摒弃了黑格尔式的宏大社会发展理念,而是将康德对先验人性的划分有机融入到实践主体性的多个维度之中,从而深刻了主体性的内蕴。在保持与正统意识形态密切联系的同时,也通过康德走向了“现代性”的理论可能。另一方面,主体性概念比人道主义思想更加全面,理论的延展空间更大,如果说人道主义仅仅是告别历史的热情和实现人生价值的路径,那么主体性则通过社会、文化、群体、个体等概念直接为新时期的人们找到了存在的“意义”,并成为从传统到现代、从工具论到普理性、从政治统摄到个体生存的理论承担。

显然,“主体性”作为人道主义在知识和理论领域的延伸,其在1980年代新时期出现有着社会文化和美学学科自身的原因,也有着历史的必然性。同时,主体性也成为一种桥梁和过渡,实现了从集体话语、个体彰显,再到诗化哲学、审美自由和审美文化的转型,文学与美学也在不断地与政治决裂的过程中,实现了个体的自由和审美的理想。

首先,就社会文化语境而言,主体性思潮

是知识分子重拾话语权,并在美学、知识和意识形态领域实现对专制主义的批判和集体主义话语的反拨。1980年代的思想政治语境使得知识分子在自省中寻求独立的人格,在批判中找寻完满的主体,以启蒙的姿态重拾“为生民立命、为天地立心、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现实热情,而主体性以其人文性和能动性恰恰具有了理想与现实的双重映射,在精神和文化领域实现具有影响力的话语权。“每一种‘领导权’的关系,必然也是教育的关系。”<sup>[1]</sup>李泽厚通过引入康德“先验主体”的范畴,建构了整体化、动态化的群体主体性和个体主体性,并进而使主体在美学中得到超越与升华;刘再复则以颇具浪漫气质的文学主体性话语言说,给予文学创作者和接受者以自由以及文学的本体价值,而最终人道主义和情感的释放则是对抗霸权统治的有力工具,最终使得不自由的人成为自由的主体存在,“大致可以说,1980年代前期,关于‘文学’独立内涵的建构始终处在文学/政治的二元结构中”<sup>[2]</sup>。

其次,就文学和美学自身的发展而言,主体性是对文学回归自身属性和人道主义话语深入的结果,是“人的文学”和“文学是人学”在“美学热”中的集中体现。文学主体论作为建立在哲学主体论基础上的、对文学本质内涵的概括,把文学活动看做主体实践的结果,这不仅仅是对现实的反映,更是主体自由的彰显和文学自主存在的基础。刘再复就以“内宇宙”的方式强调了创作主体的个体活动和精神体验在文学中的关键作用,而优秀的文学也能够人道主义和人性维度开拓出表现的深度和广度,为主体的自由存在找到合法性的意义。这也是对周作人倡导的“人的文学”、巴人倡导的“人情”“人性”、钱谷融倡导的“文学是人学”等理论的延续,也是新时期“共同美”“形象思维”“人道主义”“手稿热”等问题在文学中的进一步体现。人性和人情

就成为文学的本体化内涵,也是文学和美学本身的价值属性所在。可以看出,主体性经由李泽厚和刘再复的发掘,使得人道主义思潮以系统理论建构的方式进入“美学热”的讨论之中,并成为“美学热”中诸如实践美学、文艺美学、后实践美学、文艺美学的理论基础,更加深入地使作为主体的“人”摆脱政治工具论和机械反映论的束缚,从而为美学和文学理论的发展探索出一片广阔的天地。

## 二、主体性美学的深化:李泽厚的“双重主体”哲学观

李泽厚作为1980年代新时期最早倡导主体性的哲学家和美学家,以其“主体性实践哲学”和“人类学本体论”实现了哲学从“斗争哲学”向“吃饭哲学”的转型,用“内”与“外”的主体性双重结构实现从群体主体性到个体主体性的建构。总体看来,李泽厚的思想脉络大致可以划分为三部分,分别是主体性实践哲学、实践美学和思想史论述,主体性实践哲学是其美学和思想史的基础,也是对建国以来哲学面貌的一次突围与调整。李泽厚通过对康德的研究和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再发掘,最终建构了从主体性、自然的人化、心理本体、文化心理结构、积淀说、新感性等一系列从哲学到美学的理论框架,而人道主义归属、人文关怀和主体性则是其理论中一以贯之的脉络。众所周知,建国以来的哲学基本上处在唯物/唯心、个人/社会、小我/大我的二元对立框架之中,正统马克思主义哲学由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构成。如果仅仅是作为哲学思想,马克思主义固然有着强大的历史性阐释空间,然而,政治话语高度统摄和“文革”时期的集体规训使得个体被抽象的历史群体运动所遮蔽,主体的价值也被湮没在宏大的“人民群众”之中。新时期以来,伴随着政治上的思想解放和拨乱反正,哲学界、文学界等纷纷以反思的力度和人道主义

思潮对其进行调整,李泽厚的哲学正是为了跳出“二元对立”的哲学框架,通过彻底的“话语转移”完成哲学层面的变革。如果说马克思《手稿》中的“实践”“异化”“自然的人化”“美的规律”等问题给予了李泽厚主体性哲学阐释的“合法化”空间,那么康德的主体性论纲则成为理论改造的主要内涵,《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哲学与建立主体性论纲》《美的哲学》等是对实践观点和人类主体性的重要突破。“五四是在封建权力几千年控制下的觉醒,80年代是个人在集体权力几十年控制下的觉醒。”<sup>[3]</sup>在1980年代新时期,个人意义与价值的确立其实尚处在反思与调整的阶段,当宏大叙事和集体话语坍塌之后,个体是以反思的形式重塑历史与价值,还是进入到欲望背后的虚无,是个体、社会和思想界进一步寻求的话题。而李泽厚采用康德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生发出实践维度的主体化学说,从哲学的维度上丰富并肯定了主体存在的价值。其中,《批判哲学的批判》正是李泽厚在“文革”期间对社会的反思和对康德哲学的吸收和化用的成果。如果说康德超越了历史上以往的唯物论者和唯心论者,那么李泽厚引入“实践性”则弥补了康德的“先验主体”来源问题,从而将康德和马克思有机结合在一起。

由此,李泽厚首先通过“双重结构”建立起群体主体性的哲学观,并且将康德“先验主体”的来源更改为马克思主义实践观。这样,李泽厚的主体性实践哲学就实现了两个维度的突破:其一是对高度统摄的集体主义话语和对机械历史进程的调整,从而更加重视主体在历史中的实践作用和建构作用,提倡以“人类本体”为核心的实践哲学;其二是对过于经验论的个人主义进行反拨,强调物质性实践对主体能动性和基础性的建构作用,从而废除了费尔巴哈式的个人空想。“康德的先验论之所以比经验论高明,也正在于康德是从作为整体人类的成果(认识形式)出发,

经验论则是从作为个体心理的感知、经验(认识内容)出发”<sup>[4]83</sup>,而能够弥补经验论的恰恰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李泽厚有机吸取了马克思和康德的理论资源,使用双重结构和内外统一的方式实现主体性实践哲学和人类本体论。从外部而言,群体主体性具有社会性和实践性的特质,是具有“工艺—社会结构”的“社会人”;而从内部而言,群体主体性则是具有个体独特的情感、意志等“文化—心理结构”的“个体人”,这两者之间相互联系、密不可分。而此种主体性首先是立足于群体和人类学视野中的主体性,之所以肯定群体的主体性特质,仍然是基于对人类物质性实践基础地位的重视。因为对于历史实践而言,个体的物质实践无法具有改造和参与历史的力量,只有群体性的物质实践才能积极建构历史和主体自身,这也正是李泽厚的历史理性主义倾向和人类总体性决定作用的话语选择。也正是此种物质实践基础,才得以打破康德先验认知结构框架的神秘性和超验性,使主体成为活生生实践中的主体。所以,社会意识和文化心理结构也“浓缩”和“反观”在每一个个体主体的心灵世界之中,个体也不再是传统意义上“集体”的对立面,而是群体性主体的有机组成部分,并同样具有能动的作用。这样,由实践产生的“认识形式”也是主体“本质力量对象化”的结果。群体性的主体实践最终仍然落实到个体化的心理结构,而个体心理结构的丰富性、独特性和多元性也“优于和早于”人类群体的普遍性。群体主体性和个体主体性就在实践和意识的维度产生了辩证的关系,实践参与了人类群体历史的建构,也产生了人类的逻辑、思维、认知等认识结构,是具有本体性的价值存在。而群体主体性实践又是由个体主体的实践实现和完成的,“积淀”于个体心理意识之中的审美结构和感性自由,最终体现出人生存的本质价值和“对象化”的确证。所以,“感性之中

渗透了理性,个性之中具有了历史,自然之中充满了社会;在感性而不只是感性,在形式(自然)而不只是形式,这就是自然的人化作为美的基础的深刻含义,即总体、社会、理性最终落实在个体、自然和感性之上……美正是一切异化的对立面”<sup>[4]432</sup>。可以看出,李泽厚以实践为基础的认知主体,是通过集体实践、文化符号和心理积淀而建构起来的既具有群体性、又具有个体性的主体化特质,这种实践哲学也被其戏称为“吃饭哲学”,从而起到对“斗争哲学”的调整和反拨的作用。主体在新时期的建构也是通过物质和经济生产、社会交往、文化创造等方式进行的,而不再是作为宏大政治规训和政治斗争中的符号而存在。同时,主体的文化心理结构层面作为认识结构、伦理结构和审美结构的构架,伴随着实践主体性的确立也逐步成为理论的显性话语。李泽厚试图综合历史群体与个体存在、理性与感性、必然与偶然、物质与意识等二元因素,并引入康德理论和实践观点打破二元对立的格局,进而建构出从“工艺—社会结构”到“文化—心理结构”的双重辩证主体属性。当然,圆融综合式的理论也受到保守派和激进派的双重质疑,内在的矛盾也始终贯穿其前后理论的架构中。但这也恰恰是李泽厚不同于他人的理论深刻之处,对历史理性主义的强调也使得主体性概念扎实地建立在物质实践和哲学思辨的基础之上,扭转了空洞肤浅的对于人道主义的话语言说。同时,主体性实践哲学的理论也在不断地进行调整和补充,对心理本体和情感本体的确立与高扬正是人类学本体论进一步发展的方向,这也是主体性经由“群体性”过渡至“个体性”的进程。

自《批判哲学的批判》确立历史唯物论和主体实践论的基本观点之后,李泽厚进一步将理论视角从“群体主体性”转移至“个体主体性”,更加重视心理本体、情本体以及个体

的感性生命存在的特殊性,并进而在实践的主体中增添伦理学和美学的内容,确立实践美学的理论框架。这也是从现实层面的“反思革命”转移至更加注重个体生存的“文化启蒙”,成为理论的进一步延展和生发。“应该看到个体存在的巨大意义和价值将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愈显突出和重要”<sup>[5]</sup>,这一“个体主体性”概念的出现无疑给当时的思想界注入了强大的活力,人们纷纷选择性地接受了“个性”“文化”“生命”等关键词,并且成为构筑新时期现代性的重要理论资源,也直接启发了“文学主体性”和“后实践美学”等理论的出现。对于个体主体性而言,李泽厚依然重视其物质实践性,但是只是作为其理论背景而出现的,而主体性的“文化—心理”结构则构成了人性结构的主要组成部分。与康德类似,李泽厚同样把主体的意识活动和心理结构划分为认识、道德与审美三个方面,只不过其逻辑前提由康德的先验理性转化为了主体实践。认识能力是理性的内化的结果,主要体现为主体的智力水平;道德能力是自由意识凝聚的结果,主要体现为意志结构。而在思想界和美学界产生主要影响的则是对主体的审美能力的界定,它是由理性的“积淀”所形成的审美结果,是包涵着快乐和自由体验的审美体验。“它们落实在个体心理上,却是以创造性的心理功能而不断开拓和丰富自身而成为‘自由直观’(以美启真)、“自由意志’(以美储善)和‘自由感觉’(审美快乐)。”<sup>[6]</sup>由此,一个完整、系统和均衡的主体性心理结构得以完成,而“积淀”则凸显了“人化”的心理结构,并且为美学和审美活动的产生奠定了基础。积淀在感性和理性的双向维度中产生,如果说在认识或伦理活动中,理性需要突破感性的局限,上升至逻辑和科学的范畴,那么在审美和文艺活动中,从理性中积淀而生的感性就要占据更为主导地位,这种渗透了理性的感性是更高层意义中的审美

体验,是超越生物学、感官化层面的精神自由。比如穿衣不仅仅是为了保暖御寒,更是更高层次的服饰审美与符号认同;吃饭也不仅仅是为了补充能量,而是文化美食。所以,积淀构成了从社会物质结构向文化心理结构,进而向审美结构转化的方式和中介,也促使了情感本体的建立与内在自然的人化等美学概念的生成,为实践美学和生存论美学找到了合法存在的理论依据。由此,李泽厚完成了其关于主体人性结构的哲学理论梳理,而审美作为个体主体性的最高表达,也就通过“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完成了美的自由形式的建构,最终为个体主体性的自由生存和美学的自由表达找到了合法化存在的依据。其实,个体主体性和群体主体性的矛盾时刻贯穿在李泽厚的理论体系之中,在《哲学探寻录》中的“为什么活:个人主体性”中就体现出浓厚的悲凉意识与反抗意识。个体主体性的选择是建立在实践基础之上的个人意志选择,而个体的存在又受到康德所认为的先验道德或者群体实践的整体化、历史性规约,那么个体的意义是在总体化生存的个人贡献中得到体现,还是在自由选择的生命体验中得以澄明呢?这也正是李泽厚后期理论转向实践美学和中国古典传统文化的原因,他试图以感性解放的主体和深沉的文化意识完成对“个体主体性”的超越,这也启发了刘再复、刘小枫等人的文学主体性和审美超越观。李泽厚主体性哲学的时代价值,正是全面系统地确立了主体性和人性的哲学地位,在政治统摄的语境中和机械反映论的规约下,树立了人的主体性实践价值和能动的精神意识活动,产生了较为强烈的社会影响。其实,李泽厚所倡导的主体性也具有介入社会现实的意识形态功能。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不仅仅实现了对“革命的哲学和批判的哲学”的调整,更是具有了现实意义的“经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意义;而康德哲

学中有关对历史学、伦理学的论述以及对资产阶级市民阶层先验主体性的探讨,则给予了李泽厚主体性哲学进一步“告别革命”的理论依据。可以说,主体性哲学给予了“文革”之后广大青年人和知识分子以精神价值、道德判断和感知方式以重新建构的契机,并使之成为迥异于革命诉求的“新人”,引领起一代人的精神导向。

### 三、主体性美学的延展:刘再复文学主体性及感性主体的超越

如果说李泽厚的主体性哲学论述从“工艺—社会结构”“文化—心理结构”和人类群体、个体身体四个维度建构起复杂且完整的主体性内涵话语,那么刘再复文学主体性理论则更加具有直接性和针对性,主体正是在实践中具有自由意志和能动作用的人。主体也可以更加清晰明了地划分为实践主体和精神主体,而精神主体也正是“内宇宙”和“第二宇宙”。在文学活动中,彰显出主体生存的自由和自身独特的价值;而主体性理论也赋予了文学活动、创作者、接受者和文学形象以独立存在的自律性意义。所以,正是在二者交互作用的互动之中,文学主体性思想成为刘再复学术思想的核心。他将李泽厚对主体哲学和美学上的阐释,转移到更为形象的文学和文学理论之中,并通过文学和审美主体之间的辩证关系,凸显其充满激情的理论话语,进而实现其“美学意识形态”的效果。如果说西方的主体性反思更多地是立足于先验的理性和物质的压制,高度发达的技术文明不断吞噬审美的感性力量的话;那么中国的人性、灵性和主体性则更多地是被政治意识形态和“过多的理念”所湮没<sup>[7]</sup>,所以主体的解放和个体的彰显构成了整个后现代时期“普世性”的话语模式。所以,1980年代新时期的理论家们敏锐地觉察到文学和审美精神对主体解放的关键性作用,以及对抗政治压抑的审美

解放伦理。这样,就一方面恢复了文学作为“人学”的应有之义,从而使文学在政治规训和统摄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重塑人思考问题的能动性和自由性,对李泽厚严密而又复杂的主体性内涵进行简化和超越,文学和审美便成为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自由自在的超越和体验。

首先,刘再复简化了主体性的内涵,并将其与文学活动联系起来。“主体是在实践中建立起来的概念。人既是主体,又是客体。”<sup>[8]</sup>这样,就仍然肯定了实践在主体建构中的关键作用,能动的实践也正是主体性原则的体现,“实践主体”就构成了主体性的第一个层面。与此同时,人在实践中也能够与对象建立起认识的关系,与认识对象之间的主客体关系也就成为第二个层面的“精神主体”。刘再复更为看重的则是精神主体的超越性和自由性,文学主体性也正是由精神主体延伸而成的。而人生存在自然社会中,同样也受制于自然规律和社会关系的制约,所以主体性的自由就更应该体现在精神维度的超越性之上。如果说李泽厚是从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发生学的角度来论证“人类学本体论”,那么刘再复则通过具体的文学指向和审美超越彻底摒弃了机械反映论、政治工具论和狭隘的物本主义,从而生发出普世价值更为浓厚的、以人为核心的主体性概念。在刘再复看来,从文学的角度对李泽厚的主体性哲学进行超越是人追求自由的另外一种方式,所谓“工艺—社会结构”的科技和理性世界并不完美,西方的启蒙现代性就已经呈现出工具理性对主体的压抑,所以只能从审美的维度使主体获得自由。而文学的主体性正是使得美学独立和审美自律成为可能,也成为通达主体性自由的重要途径。此种精神超越和文学独立的主体性理论也一方面衔接了巴人、钱谷融等理论家的“文学是人学”理论,而另一方面也和现代美学史上的王国维、蔡

元培、宗白华等“审美无功利”思想遥相呼应,正如“天下之人嚣然谓之曰无用,无损于哲学、美术之价值也”<sup>[9]</sup>。蔡元培也认为美学和主体性密切相联,具有超脱和无功利的性质:“陶养的工具,为美的对象;陶养的作用,叫作美育”<sup>[10]</sup>。而刘再复的主体性理论和对精神主体的重视,恰恰也具有历史上文化启蒙的意味,将1980年代的知识话语和人性诉求同“五四”时期的启蒙传统衔接,简化和深化了主体性的内涵。

其次,刘再复在主体性的理论建构中更加强调精神主体和文学主体的作用,这也是和主体的自由性与超越性一脉相连的。人的主体性不仅仅包括实践主体性,还应该特别包括精神主体性;人在精神世界中同样具有创造性、能动性和超越性,并且精神上的自由能够对现实的规约进行调整,从而恢复完满的人的存在价值,“内宇宙”便由此产生。“人的精神世界作为主体,是一个独立的、无比丰富的神秘世界,它是另一个自然,另一个宇宙。我们可称之为内自然,内宇宙。”<sup>[8]</sup>对于内宇宙和精神主体的强调终于在某种程度上为受制于社会和历史的主体找到了追寻自由和超越的途径,这就使主体性不仅仅具有本体论维度的含义,更是具有了价值论上的话语承担。在此基础上的“文学主体性”也就超越传统意义上对社会与自然的“反映论”,而成为主体抒发情感、彰显意志、自由体验的生存方式。对于建国以来的主流文学理论而言,受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主要呈现出两个维度的特质:第一是以唯物论为基础,通过典型的形象塑造表现丰富的社会生活和人民大众,机械反映论成为文论的基本价值取向;第二是文学和文论始终处在政治性、集体性和阶级性的话语统摄之中,工具论已经取代了文学本应具有的丰富性、个体性和多样化面貌,造成这两者的原因正是“文学主体性”的丧失。所以,刘再复吸取了李泽厚的实践

主体性观点,并以激进的“美学意识形态”话语将主体性在文学和审美领域展开,这本身就是对精神主体和“内宇宙”的肯定,因为文学作为人的精神创造,与人的心灵和意识活动密不可分,文学主体性也正是针对机械反映论和政治性、工具性来展开的。

一方面,文学主体性更加重视对个体精神世界的体察,试图发掘文学活动中创作者、文学形象和接受者独特的心灵感应,这就直接回归到了“文学是人学”和对人本体价值的尊重,也成为1980年代人道主义、人性、人情在文论领域的另类呈现。“文革”时期的文学以“高、大、全”的形象成为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的文化符号,其本身缺乏作为活生生的“人”的血肉和灵魂,而刘再复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正是忽略了精神世界的丰富性和具体性,“抽象的空壳”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内宇宙”丧失的结果。由此,个体主体的“内宇宙”精神活动成为文学活动的主要元素,进一步打破了社会/文学、物质/意识、理性/感性、现象/本质等束缚文学表现的二元机制,把个体、精神、文学形象、接受者,乃至文学本身都看做是具有独特性、能动性的主体性存在。在此前提下打破以物质为中心、人的意识作为被动反映的传统文论模式,从而为朦胧诗、意识流等现代主义文学类型提供了理论存在的合法性空间。所以,在此理论指导下,文学活动要处处把“人”作为主体,并且充分发挥“内宇宙”的精神体验作用,从而实现对外在社会、自然和环境的超越。从创作者的角度而言,应该自由自觉地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摒弃教条化和概念化的创作倾向,将艺术思维的对象情感交流和具有自身逻辑发展的同类主体,以“主体间性”的方式通达“物我合一”“神与物游”的境界。从文学形象而言,要充分服从形象自身的多元性、复杂性和灵魂自主性,卧轨的安娜、乖张的贾宝玉、自我安慰的阿Q等都是神形兼备、真情真性的主体

形象,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已经超越了创作者的控制和支配。法国作家莫里亚克曾经表示,他在进行文学创作活动中,笔下的主人公的性格发展逻辑和情感走向往往超脱了自己所能控制的范畴,甚至和他原本的人物设定发生了完全的倒转,人物的言行也超越了他本来的设定。但是文学主人公自主性的获得并非弊端,恰恰是文学成功的标志;相反,如果笔下的人物完全成为作者和时代的“传声筒”,那也将是“糟糕的标志”<sup>[11]</sup>。而从接受主体而言,应该肯定他们在文学鉴赏和文学研究中的能动性作用,也正是通过“视域融合”与“审美共鸣”的方式实现接受主体与创作主体、形象主体之间的对话,从而共同参与并构建文学史。而在此三者主体性的确立中,“内宇宙”的精神活动和审美体验就构成了“同情”的主要方式,也是进行情感交流的前提。

另一方面,文学主体性也促使了文学自主性和审美自律的诉求,以审美超越和审美自由的视角实现对工具论和阶级论的反拨。众所周知,文学在“文革”时期成为革命和阶级斗争的工具与“螺丝钉”,是无产阶级文化阵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坚守着为工农兵服务的价值立场。文学作为多学科的互涉并具有深刻的思想社会内容无可厚非,但是当政治功能凌驾于文学之上,就会对文学自身的发展产生消极的影响。而文学的主体性赋予了创作者、接受者、文学形象以至文学活动以多维度的能动性和独立性价值,将其表现的视域从机械地对外在现实的反映转向主体自身情感的审美体验,并将其融入到形象的塑造和丰富的文学表现之中。对于文学自身而言,要树立主体性话语就需要以“内宇宙”均衡三个关系。其一是与环境的关系。文学并非单单是外在环境的反映,同时也因为主体能动的利用、影响、改造和移情的作用,使“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多如是”的“万物复情”的效果。《文心雕龙·神思》中有云:

“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我才之多少,将与风云而并驱矣。”<sup>[12]</sup>《文赋》中同样以“物一意一文”的辩证关系强调了主体以“同情”的方式对自然的观审,“精骛八极,心游万仞,其致也,情瞳眈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sup>[13]</sup>。所以,自古以来的文学和文论中就饱含了主体超越环境束缚的想象力、自由感和宇宙感,而自然环境则呈现出“平时可娱之物,见之而泣,闻之而悲,则时可知矣”的人化面貌,二者以“同情”和“移情”的方式完成了心物合一,单纯地以“环境决定论”来取代主体的多样性无疑是不利于文学自身发展的。文学的主体性恰恰是恢复自古以来的主体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并且以审美体验的方式实现大化流转和万物复情。其二是与阶级性的关系。主体的实践属性固然具有群体性的特质,也会被打上民族、阶级和党派的烙印,但是作为个体心灵“内宇宙”活动的文学和人性,如果完全被阶级斗争所统摄,那么无疑是以共性取代了个性、以单面化取代了丰富多元的心灵选择<sup>[8]</sup>。其三是具体到文学创作层面,是塑造人物的灵魂特征和肤浅的外在冲突的关系,这主要涉及到创作者的形象塑造和文学作品本身的灵魂。优秀的文学文本应该是以塑造深邃和丰富的主体灵魂为主要指向,并以此典型的力量来映射现实与社会。而“文革”时期的一些作品却主要描述了革命运动、外在冲突、战争经历等等,个体和形象已经成为宏大叙事的符号,所以造成了文学形象的苍白和艺术水准的降低。文学主体性提倡以外部事件来表现人物内心“内宇宙”的丰富性和多元性,“人”才是最终的落脚点和价值旨归。艺术创作者和作家更应该深入到自身和文学形象的精神深处,充分焕发人的主体力量,“作家的精神需求(主观需求)带有无限性”<sup>[14]</sup>。当这沟通着人道主义和文学精神的“内宇宙”深入到文本的“规定性”中,正是“性格组合论”的理论承担。性格组合论以

其对人“相反而又相承”的多元性格复杂性的分析,促使文学呈现出深刻的典型形象,进而打破单面化的“集众美于一身”或者“集众恶于一身”的脸谱化弊端,建立一种人性维度的性格二重组合理论。这与其说是“内宇宙”的显性表征,更不如说是对人道主义和主体性在文学和审美中的理论呈现。它完成了从精神主体到文学主体,再到文学创作手法的进程,最终为文学的超越、自由和人性找到了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实现方式。可以看出,刘再复的文学主体性最终还是指向美,指向个体感性的审美体验与精神自由;而主体性也以浪漫气质的“逍遥道人”形象完成了“向内转”,彻底破除了政治规训、环境限制和集体话语对文学的“侵蚀”,成为继李泽厚主体性实践哲学之后主体性理论的进一步延展。如果说李泽厚还通过辩证综合的视角对人性进行从物质实践到文化实践的阐释,并“戴着黑格尔和马克思有色眼镜”<sup>[15]</sup>的话,那么刘再复则彻底排斥了群体话语和宏大的历史观想象,并进而转向了更为具体的文学和美学领域,实现文学和主体性二者的自由与超越。

从李泽厚到刘再复,主体性经历了从群体化、物质性的实践主体性,到个体化的文化心灵主体性,再到“内宇宙”式自由的文学主体性进程,为人道主义和人性找到了哲学与美学意义上的理论表达,从而引发了一个时代的美学热情。李泽厚在马克思和康德的领域中为主体性的合法化开辟了一席之地,而刘再复则进一步向“文学是人学”的浪漫境界登峰造极,试图完成知识分子主体性问题阐释的知识谱系。其实,无论是李泽厚在哲学维度对主体性的思索,还是刘再复充满浪漫情怀的文学主体性,否定、批判、反思、实践、人性、生存和自由都构成了其理论的关键词,为 1980 年代的人道主义思潮增添了亮色,更是成为一代人的“精神导师”。这不仅仅是理论的突破和干预现实的热情,更是人们在哲

学、美学和文学中找到了人性存在的合法性价值与理论依托,给春寒料峭的时代和边缘化的自由诉求提供了温暖的关照与呼唤,“最核心的思想呼唤是对人性尊严与文学尊严的呼唤,尤其是呼唤个体生命尊严与个体精神价值创造的尊严”<sup>[16]</sup>。

### 参考文献:

- [1] 安东尼奥·葛兰西. 狱中札记[M]. 葆煦,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33.
- [2] 贺桂梅. “纯文学”的知识谱系与意识形态[J]. 山东社会科学,2007(2):29-41.
- [3] 李泽厚. 理想、激情和希望的年代[N]. 南都周刊(试刊号),2006-01-20(05).
- [4] 李泽厚. 批判哲学的批判[M]//李泽厚十年集(1979-1989):第2卷.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83.
- [5] 李泽厚. 康德哲学与建立主体性的哲学论纲(1980年)[M]//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213-214.
- [6] 李泽厚. 关于主体性的补充说明(1983年)[M]//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222.
- [7] 刘再复. 近十年的中国文学精神和文学道路[M]//刘再复集——寻找与呼唤. 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8:242.
- [8] 刘再复. 论文学的主体性[J]. 文学评论,1985(6):11-26.
- [9] 王国维. 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M]//王国维集:第1册. 周锡山,编校.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181.
- [10] 蔡元培. 美育与人生[M]//蔡元培美学文选.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220.
- [11] 莫里亚克. 小说家及其笔下的人物[M]//法国作家论文学. 王忠琪,等,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192.

- [12] 刘勰. 文心雕龙·神思[M]//陆侃如, 牟世金. 文心雕龙译注:下册. 济南:齐鲁书社,1982:85.
- [13] 陆机. 文赋[M]//张少康. 文赋集释.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14.
- [14] 刘再复. 性格组合论[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523.
- [15] 张旭东. 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西方普遍主义话语的历史批判[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25.
- [16] 刘再复. 论高行健状态——在香港科技大学、浸会大学、理工大学的讲演[M]. 香港:明报出版社有限公司,2000:15.

(责任编辑:白丽娟)

(上接第21页)

## 参考文献:

- [1] 朱文通. 李大钊年谱长编[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30.
- [2] 北京大学图书馆,北京李大钊研究会. 李大钊史事综录[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12.
- [3] 中共唐山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秦皇岛市委党史研究室. 李大钊与故乡[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
- [4] 中共河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编审委员会. 李大钊在河北[M].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1.
- [5] 严兰坤,张岗. 河北通史:明朝卷[M].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
- [6] 陈金骏. 乾隆乐亭县志[M]. 明清乐亭县志点校本.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8:155.
- [7] 史梦兰,游智开. 光绪乐亭县志[M]. 台北: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69:83.
- [8] 田培栋. 明史披拣集[M]. 西安:三秦出版社,2012:14.
- [9] 张廷玉,等. 明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74.
- [10] 孙承泽. 天府广记[M]. 北京:北京出版社,1962:19.
- [11] 顾炎武. 著日知录集释[M]. 黄汝成,集释;栾保群,吕宗力,校点.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 [12] 白寿彝,王毓铨. 中国通史(15)[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15:537.
- [13] 林延清. 明清史探究[M].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40.
- [14] 赵其昌. 明实录北京史料[M]. 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5.
- [15] 李洵. 明史食货志校注[M]. 北京:中华书局,1982:12-13.
- [16] 王艳萍. 李大钊与唐山[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58.
- [17]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共产党昌黎县委员会. 昌黎县史[M].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5:43.
- [18] 乐亭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乐亭县志[M].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62.

(责任编辑:李秀荣)